

上海百年公交历史记忆(上)

◆ 姜浩峰

“中运量公交 71 路的开通,让我想起了 30 年前上海曾有过的一条线路——401 路。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通的,从田林新村到杨树浦的线路。可以说是当时的一条超长线路。和现在 71 路一样,当时的 401 路是巨龙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薛理勇先生说道。在这位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上海地名学会副理事长看来,每一次上海城市规模的扩大,都会给公交系统带来变化。

上海,自 1843 年开埠后,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到了 20 世纪初,出现了有轨电车,继而有了公共汽车。因为当年的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特别是还有越界筑路的模糊地带,造成城市公交不成系统。到解放初期,上海公交线路共 44 条,运营车辆 934 辆,年运客量 2.37 亿人次。之后,上海公交趋向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回首往事,这一过程却又是筚路蓝缕的。

根据上海市档案局资料,2007 年,全上海市有公交线路 974 条,公交车辆 16944 辆,当年运营里程 11.32 亿公里,当年全市公交客运量 26.50 亿人次。这一数据,当时即创下了运营规模、运营里程和载客人次三项世界第一。又是若干年过去,记者手头一份 2015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公交线路总数达 1354 条,而这一数据还是不含区间车、临时车、小区班车在内的。

如今,百年上海公交系统,则正在逐步更为“健康”,无论是轨道交通,还是中运量公交,或是普通公交、社区巴士等,都将配合起来,让城市更具活力,让城市更美好。

因城市规模扩大而生

开埠之前的上海县城,方圆不过九里地,老百姓串个门、赶个集,交通主要靠走,通信主要靠吼。官员、乡绅之类的,一乘轿子亦即代步工具了。

从 1843 年上海开埠开始,在城外设了租界,但很长的一段时期,城市面积保持在 10 平方公里左右。那时候,城里的代步工具,除了特别有钱者乘坐马车以外,主要使用的是独轮车、黄包车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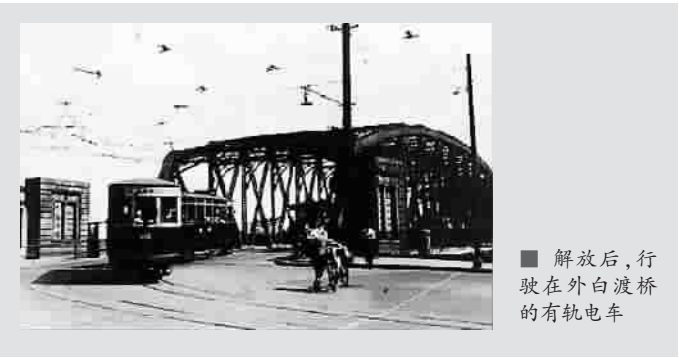
到了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正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招标,说是要开办公共有轨电车事业,继而,英商布鲁斯·庇波尔公司中标。

提及为何会在 20 世纪初开始将公共交通提上议事日程,薛理勇告诉记者:“那时候,上海城市规模已有长足扩大,达到方圆 50 平方公里了。比如从杨树浦到徐家汇,就达到 15 公里。这么长的路程,单靠独轮车、黄包车是不行的,人力车夫脚劲再好,也很少有人能跑下来。”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工部局与布鲁斯·庇波尔公司签订专营合约。

正如如今一些小公司嗅得风气之先后提前布局,又转手项目赚得第一桶金,种种原因,导致布鲁斯·庇波尔公司没有自行经营该项目,而是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二月将专营权转让于英商上海电气建设有限公司,由英商公司成立电车部经营,称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简称英电)。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1908 年 3 月 5 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始营运,线路总长 6.04 公里,



■ 解放后,行驶在外白渡桥的有轨电车

从静安寺开到外洋泾桥上海总会亦即上海外滩如今华尔道夫酒店的位置。这条有轨电车线路的开通,标志着上海近代公共交通的诞生。同年四月初七(5 月 8 日),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简称法电)在法租界内开办了有轨电车。最初,租界当局规划了 6 条有轨电车线路,后来因城市扩展,又有所增加。民国元年(1912 年)2 月,上海华商电车有限公司成立,次年 8 月在华界南市地区开创有轨电车事业。

薛理勇认为,上海近代公共交通的诞生,主要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包括工业发展、科技进步等元素。当时尽管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几大板块各自为政,却也不得不互相连通。比如从十六铺到提篮桥、静安寺到虹口公园等的有轨电车线路,就要穿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

民国三年(1914 年),英电开辟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民国十五年(1926 年),法电开辟无轨电车线路,大多数与英电线路连接并联营。

继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开通后,1922 年,公共汽车又在上海出现

了。“公共汽车,是中国人先开起来的。”薛理勇说,“开办人是房地产商、宁波人董杏生。”

在董杏生开办经营公共汽车业务之前,华人雷兆鹏、黄中文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创办中国汽车公司,企图经营租界的公共汽车事业,但终因工部局提出的准入条件严苛而未办成。那缘何董杏生可以办呢?

按照薛理勇的说法,董杏生得以经营公共汽车,源于租界当局的越界筑路。所谓越界筑路,亦即在公共租界之外修筑道路。即便根据不平等条约,越界筑路实际上也是非法的。但从 1860 年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公共租界就开始在租界以外筑路,比如静安寺路、新闻路、极斯非尔路(今万航渡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等。1899 年,上海公共租界大扩展以后,绝大部分越界筑路已被并入该租界。但自 1901 年以后,该租界再度向外围地区大规模越界筑路,准备将这些地段列入进一步扩展的范围。这样的蚕食行为,名不正言不顺。尽管租界当局向这些地方

派驻了巡捕,也去收自来水捐之类,但与正式租界不同,中国政府仍能在越界筑路区域征收一些捐税。

董杏生希望开辟的公交线路,系从静安寺到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因为地处越界筑路的模糊地带,当时又是市郊接合部,租界当局亦就首肯了。1922 年 2 月,董杏生正式向工部局申请注册成立中国公利汽车公司。公利公司旗下仅有两辆德国的霍克牌客车。每辆车的载客量是 30 人左右。当年 8 月 13 日,这一 4 公里长的线路通车了。然而,当线路开通后,工部局却开始作梗,要求公利公司必须每季度缴纳执照费白银 100 两,道路费另捐白银 10 两。

“董杏生为啥要在静安寺到中山公园开一条公交线?”薛理勇告诉记者,“有一个原因是他的儿子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线路开通运营那天,他儿子的同学们坐满了车厢,摇旗呐喊,好不热闹。”圣约翰大学位于中山公园西侧,即如今的华东政法大学位置。当时此地除了大学和公园以外,周边都是农田。除了大学生坐车,还有农民进城卖菜的会坐车,或者市民休息天出城去公园会坐车。当工部局要求董杏生缴纳大额执照费和道路费后,公利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毕竟,车资定价本来也就每趟几分钱,更何况圣约翰大学学生都是董公子的同学,许多人随着董公子上车,根本不用买票。

由此,公利公司仅经营了几个月,就因亏损严重难以为继。到 1924 年,华界闸北地区出现过一家市兴公共汽车公司。然而,在那个年代,真正做得起来的公交公司,还是外国人的。

上海方城

余之



26.物归原主

“依讲得亦太好了,我看马马虎虎。”柳梅存心要套小丽更多的话。小丽瞪大眼睛故意说:“啥?马马虎虎?依勿要,把伊让拨我,依拨伊住的地方告诉我,我明朝去找伊。”“去你的!”柳梅推了小丽一把,心里充满了满足感。

小伙子在上海一共呆了三天,以后两天,两人又有过两次接触,一次去拜访了沪江大学的唐教授,在柳梅的陪同下参观了学校在苏州河畔的校园,并在茶室里,喝了茶;最后一天两人去了近郊,游了龙华寺。他们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通信,又有三天在上海的实地接触,沟通比较深入了,感情发展顺水顺舟,应该说,已经到了瓜熟蒂落,只待拜见高堂、商定良辰吉日的地步。

上海三日之行,小伙子收获满满,心里充满了喜悦,按唐教授的说法“实物见证”后,两人在敲定关系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像是吃了定心丸。小伙子回广州后,即抽时回了香港,向父母禀报了上海之行的收获,还给父母看了柳梅的玉照,父母对柳梅的气质、长相赞口不绝。这是一喜,但还有一忧,这就是小伙子的母亲的肺部被查出有一块阴影,这些日子总是咳嗽不止。母亲对儿子说,她担心是不好的毛病,希望儿子能早日成婚,让她在有生之年看到第三代。儿子总是安慰母亲说,不会有碍的,在香港请专家诊治,如果再不行他设法让母亲到美国去治疗。

小伙子有一喜一忧,而柳梅却是喜上加喜。即她妈妈的抄家物资——翡翠麻将物归原主,重新回到了梅香的手中。曼丽看到这副依然崭新的翡翠麻将,连连赞道:“介多年数了,还是老样子,铮亮咯,嚟,嚟!选种‘老价生’真是越老越值铜钿。”梅香想要是真能值铜钿,还是让伊“出送”算了,投资办一个福利院。她也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她一直有一个愿望:想在退休的时候办一个专供老人们休

生养息的福利院,一来她可以与柳叶有一个归宿,二来她也喜欢安静,与一帮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在一起怀怀旧,坐在午后的太阳里喝杯咖啡,这是她向往的退休生活。

龙彪说:“梅香妹子选个倒是个好主意,我看笃定,选副翡翠麻将的价佃换一所福利院是可以咯,如果不够,我与曼丽再追加投资。”曼丽说:“好啊,梅香妹子开福利院我举双手赞成,阿拉亦投资入股,阿拉阿公阿婆还留下来一些‘家当’,屋里厢还有点老底,阿拉人也要老了,留着有啥用场,做点好事积点德,到了阎王那里也会安排得好点。再讲等阿拉再老一点统统进福利院好了,呆在里厢搓搓麻将,过过神仙‘日脚’了。”梅香说:“曼丽依讲闲话总是要‘豁边’,好日脚还呒没过,就讲不吉利闲话。”龙彪批评曼丽说:“伊讲闲话一向是送能样子咯,刀子嘴,豆腐心,从旧社会过来一直是迭副‘吞头势’,梅香依与她在一道生活是晓得咯。”龙彪将话锋转过去说:“梅香妹子开福利院,那柳先生出山做总经理,再过几年退休了,就好发挥余热了。”柳叶说:“到辰光我也老了,体力不支,要做总经理的话我看还是曼丽妹子合适,伊朋友多,公关能力强,上海人讲‘头子活络’。”

曼丽说:“头子活络有啥用?年纪大了,做老太婆走也走不动了,再活络也是变成‘死蟹一只’了。”梅香说:“依讲法讲法又‘豁边’了勿是,讲得介吓人做啥,讲‘死蟹’像啥闲话?”龙彪说:“迭个真叫是‘江山好移,人心难改’,依年纪亦大了,再改也改勿脱哉。”柳叶看了看手表,说:“你们开始封官许愿,排排坐了?到了吃晚饭的辰光了,今天梅香有喜事,我请客,你们说去哪儿吃一顿?”

说话间柳梅一阵风似的进来了。曼丽见柳梅叫道:“说曹操曹操到,阿拉的贵人来哉。”梅香见女儿意外回来,故意装出勿开心的样子,说:“依今朝哪能想到回来啦,我看依勿要迭个屋里厢了,一个多月呒没看到人影子了,学堂真是的介忙啊?”柳叶说:“女儿忙是呒没办法咯,伊在唐大教授手下工作,依要放心,回来了大家就开开心心,勿要再去责备伊了。”梅香说:“依总是帮着女儿讲话。”柳梅说:“妈,我勿是回来了?我还帮依带来一个老朋友呢。”柳叶回头一看,正是他的老同学唐教授。

3.小小足球队

我心中着急,脚下忙乱,头上冒汗。胡乱地奔跑起来,可无论奔跑到哪里,眼中景色不变:三角屋顶,三层楼房,三面草影。后来总在想,自己一定是踏进了父亲经常讲的诸葛亮明布下的“八卦阵”故事里了。天欲发黑了,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境界中去了——不不,风吹草低根本见不了“牛羊”,见到的只是自己被初升的月光抛在地上的孤零零影子。虽然自己的智商一以贯之地地不那么高,但是笨小孩自有笨小孩的笨办法,我记起了新家在三层楼的第一间,当新村里终于燃亮了电灯的时候,我就把寻觅的目标锁定在了东边屋山头的三楼。灯亮着,便找了上去;灯不亮,便拐向另一幢房。就这样,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家——家中的灯下只剩爸爸一个人,奶奶和妈妈则去寻找失踪的我了……

这一节“搬家历险记”,成了我人生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童年印痕,也成了——一个最经典的笑话。要是回到弄堂时代,肯定不会如此这般狼狈地找不到家门。也许,这就是工人新村文化给初相遇的石库门文化一个小小的示威罢了。(1974 年,阿尔巴尼亚中学生青年足球队在上海访问期间,参观的地方中,除了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工业展览会,就有控江新村。1977 年,日本田径团访沪,也在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之余,参观了控江新村。控江新村不仅是工人的荣耀,也是那个时代新中国乐意向外国友人展示的幸福生活样本。)

孩提时代的我绝不可能把自己拔高到很文化的层面去观察问题剖析问题,但却可以切身体验周遭环境的巨大变异。

打弹子刮刮片滚铁圈钉橄榄核这些曾经风靡弄堂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游戏正渐渐离我远去,只剩下了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白相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好大好宽好舒畅。

当新村里的小孩渐渐增多的时候,很多非弄堂式的游戏顿时流行了起来。比如在屋山头成群结队大呼小叫地“老鹰捉小鸡”,比如在整个新村里漫无边际四处奔跑地“逃江山”。而我最有兴趣的则是在小花园里踢足

球,我们这个门牌号里的五六个孩子组成了松散型的小小足球队,隔三差五地就和其他门牌号里的足球队举行比赛,值得自豪的是“过招”的结果常常赢多输少,十场比赛总会赢上七个七八场。也不知为什么,当年踢球的孩子个个都喜欢赤脚,于是人人便成了飞奔在绿茵场上的“赤脚大仙”。

说来难能可贵,我们这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居然能够从童年一直踢到少年,横跨学龄前,小学,直到“文革”中期的中学毕业,真是可圈可点,源远流长。那时,我在球队里永久地担任左扑右挡的守门员,直到在鼻梁上架起了风度不凡的“嘎梁”(眼镜),才恋恋不舍地从绿茵球场退居到了观众席上。

至今仍记得球队里有一个小女孩,人唤“野鸭”子,是踢前锋的,极具爆发力,踢出去的球势大力沉,如若放在今天,焉知就不会是女子足球队的一员猛将?后来才知道,她的芳名就是“雅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她那在美国的父母来了上海,把她接到大洋彼岸去了。其时我们的足球队早已烟消云散各奔东西,插队落户的上山下乡,分配工矿的日班夜班“三班倒”了。

即便如此,“足球梦”依然缠身不去,有一回,古巴国家青年队来上海,在江湾体育场与上海青年队踢了一场,我们这些小伙伴球迷徒步穿过了工人新村后面的大片农田和乡村,花了一二毛钱去现场买票观看,不料上半场结束时,天降大雨,咬牙坚持到最后,个个成了痴心不改的落汤鸡“粉丝”,最后还得踏着一地泥泞一步一滑东倒西歪地回家。

控江新村时属大杨浦的上海郊外,隔着营口路便与一大片碧青绿的田野遥遥相望,有着青青的小河水,有着高高隆起的坟墩头,还有一座国民党残兵败将溃逃时遗下的一半地上一半地下的大碉堡。至于那个绕河蜿蜒在绿树荫中的村庄,记得唤作石家浜,当真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现在统统不见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延吉一村二村直至七村。

工人新村

管新生

